

中国当代

ZHONGGUO DANGDAI

经济思潮

JINGJI SICHAO

1949-1989 ▲



杨建文 葛正良

彭金官 张祖国

陈维·编

主编 魏承思

副主编 陈昕

中国当代思潮丛书

责任编辑 任关华
封面设计 陶雪华

中国当代经济思潮

杨建文 葛正良 彭金官
张祖国 陈 维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655000

印数: 1—2000

ISBN7-5426-0435-X/F·86

定价: 12.50 元

主 编：魏承思

副主编：陈 昕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沪宁 尹继佐 朱学勤 李 劼

吴修艺 杨建文 杨晓榕 严搏非

袁振国

中国当代思潮丛书

总 序

人类的思想像条河，奔腾起伏，永不停息。有时候缓缓流去，平淡无奇，只是偶尔有几束水花溅起，那便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杰出思想；有时候汹涌澎湃，一泻千里，那便是一个时代千百万人思想汇集拢来的社会思潮。可是，在以往的人类思想史著作里，只有对思想家个人的研究，很少对一个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全面考察。杰出思想家的思想固然是一代思想之精华，但在当时往往会湮没无闻，只到后世才被理解和发现。可以说社会思潮比个别思想家的思想更深更广地反映了一个时代思想的真正面貌。因此，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探寻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必将使思想史研究领域发生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社会思潮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它集中地反映了人们的愿望、要求和思想倾向，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受一定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的。由于人们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大致相同或相似，由此产生的思想、愿望和情绪才会自然而然地汇合成为一股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宏观反映。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都会在社会思潮中表现出来。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教育的、文艺的、学术的发展动向都会汇聚到社会思潮中来。社会思潮不但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并且对社会存在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力。十年“文革”期间那股极“左”思潮曾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混乱和倒退。十年改革以来，磅礴于神州大地的改革思潮则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

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伟大复兴的希望。社会思潮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凡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社会思潮是没有生命力的，也许它来时铺天盖地、浊浪排空，但在整个人类思想长河中终归是昙花一现。凡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相一致，推动着历史前进的社会思潮，即使一时被压制、排斥和责难，但它包含的真理却永不泯灭的。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不同于社会心理，但又形成于社会心理，它不同于社会意识形态，但又离不开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不明确的、自发的反映形式，社会心理表现为感情、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等。社会意识形态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反映形式，它具有明确的分工、相对稳定的各种形式，如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和哲学等等。它主要是由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经过专门努力和自觉活动所创造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相比较，它更多地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它或是以某种思想流派为形式，或是以某种理论观点为旗帜，而不是一种纯粹自发的心理状态。社会思潮从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意向中酝酿形成，它要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激发和引导。例如中国社会存在着“权威崇拜”的心理，但是如果没有过分夸大领袖作用的理论宣传，就不可能形成现代迷信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相比较，它更多地积淀着心理的因素，虽然人们常以某些个人的思想或某部著作作为思潮形成的标志，例如恩格斯曾经把但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思潮兴起的标志，但思潮决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一种意识形态能否广泛流传，成为支配人心的社会思潮，除了有赖于它在当时当地被社会所需要的程度外，还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心理，能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例如苏联经济界把追求高速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固有特征的理论，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种主要社会思潮，就是因为它符合人民群众中急于求成、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心理状态。

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中介。社会心理只是自发地、分散地反映了人们各自的利益要求，社会意识形态则是一定群体利益的理论表现。它能够帮助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因此，社会心理只有上升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才具有实际意义。社会心理要上升为意识形态，一般都要经过社会思潮的“蒸馏”过程，使其中包含的理性因素，由潜藏的变为明显的，由分散的变为集中的，由单一的变为整体的，从而为一定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料。社会意识形态要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必须和社会心理融合起来，进入人们心灵的深处，成为人们的信念和信仰。但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化为人们的社会心理，它首先必须转变为某种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思潮，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造舆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为人们普遍接受和信仰，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之后，才能在这个社会真正占有统治地位。封建主义思想是如此，资本主义思想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是如此。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普遍性、无主体性、曲折性和时代性等特点。所谓普遍性即是说，虽然社会思潮是无数个人思想意识的汇集，但它不是各个个人思想意识的简单相加，而是撇开了个人思想意愿的具体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因素，以一种普遍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社会思潮是一种群体意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群体意识。诸如家庭意识、团体意识、阶层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不同群体的人们的意识和要求。社会思潮则普遍存在于许多群体之中，往往可以为许多家庭、团体、阶层、民族、阶级所共同接受。所谓无主体性即是说它不像其它的意识活动(包括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那样总是存在着意识的主体和客体。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确定社会思潮的意识主体，它像江河的潮水一样，由这个群体涌向另一个群体，并且往往超越时空的界限。一种思潮产生之后，不但对当时当地的人群产生影响，而且经常会波及四面八方，绵延无数世纪。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和不同阶级的人所接受，如民主思潮，就是如此。各个时期各个民

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并赋予它以自己阶级的特殊含义。社会思潮发展的曲折性一方面是指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新旧思想的交替表现了历史不断前进。但人类思想的发展又不是直线上升的,有时也会有暂时的倒退。因此一种新思潮的出现未必是合乎历史必然性的;另一方面又是指各种社会思潮的不同性质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住的,它们大多是曲折地反映出来的。例如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潮最初却是以文艺复兴思潮表现出来的。当代社会主义思潮中则夹杂了与它根本对立的五花八门的思潮,如封建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等,可见要识别各种反动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社会思潮的时代性即是说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思潮,即使是同一种社会思潮,在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社会思潮总是和一定时代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总是表达了一定的社会要求。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主张尊重人的价值,争取人的解放。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看不到这一思潮的社会经济根源,把“人的解放”归结为人的抽象本性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它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其次,社会思潮总是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特点的。任何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只有符合人们的实际利益,为人们普遍接受时,才会逐渐形成社会思潮。当人们的利益关系、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时,他们的思想也必然会随之变化,于是就会出现新的社会思潮。特别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思潮也就必然呈现出此起彼伏、纵横交错的态势。因此,只有深入研究社会思潮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

再次,社会思潮是一定时代人类思想水平的标尺,一个时代

流行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往往是与这一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理论思维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吸收了那一时代许多个人的思维成果，而且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承认和接受，才能流行开来。它不只是代表了个人的思想水平，往往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代人的思想水平。因此，它比纯粹以产生了多少思想家、多少理论体系来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想水平更为准确、更为真实。

在当代中国的40年里曾经流行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它们或者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或者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或者喧闹了一番便销声匿迹，或者进入了人们心灵的深处，至今仍支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因此，分析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是研究中国国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研究，就无法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动向，当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就只能随波逐流，不可能因势利导，使人们摆脱错误思潮的影响，走上正确的思想轨道。如果不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研究，就无法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我们提出的各种目标、方针和政策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无法对人民群众产生凝聚力。领导的决心也就很难变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如果不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研究，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被它席卷而去，晕头转向，就不可能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总之，把握社会思潮发展的规律性，密切注视中国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不是纯理论的探讨，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自1987年开始，我们上海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聚集在一起，决定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通力合作开展对中国当代思潮的研究。后来这项研究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我们计划第一步用二三年的时间编选一部《中国当代思潮》资料集，使整个研究工作能够奠定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避免那种泛泛而谈的空疏学风。第二步再用二三年的时间完成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思潮研究》系列专著。虽然这是一次长期而

艰苦的工作，但我们愿意为开拓这一新的学术领域而贡献微薄之力。

魏承思

1990年1月10日

中国当代思潮

编辑说明

我们这里所指的当代从1949年始到1989年整整40年，其间各方面的社会思潮此伏彼起，历史资料卷帙浩繁，为了最集中、典型地反映40年来各种思潮的发生、发展和变迁，中国当代思潮背景资料的编辑主要遵循下列原则：

一、代表性。尽量选入某一思潮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是某一思潮早期的源起性文献或思潮发展至高潮时的指导性文献；

二、时序性。文章选编以时序为主，同时兼顾内容，将时间跨度不大，有其逻辑联系的文献编辑在一起；

三、客观性。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实事求是地编选能反映特定时期、特定思潮的文献，所有入选文献并不包含编者对它的价值判断；

四、全面性。当对某一思潮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时，尽可能同时收入；

五、以全文为主，文章特别长而又有许多内容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时，摘录其部分内容；

六、由于篇幅所限，在某一思潮有多篇重要文献而又无法都予以收入时，以存目形式保存未能入选的文献；还有一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是考察各方面思潮的重要历史背景，但为了避免在各卷重复出现，在没有直接关系的分卷内亦以存目形式辑入。

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在编选时未能一一征得原作者的同意，特别是有些作者经过历史变化已经改变了原先的观点，而我们不能充分反映这种变化，为此，我们对这些作者深表歉意！我

们这里是把它们作为历史资料来反映的，而不涉及对任何个人的褒贬或评价，我们相信，有关作者能对此予以谅解和支持。

《中国当代思潮》编辑委员会

序 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开创了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同时，我国经济理论的探索研究也出现了历史性转变。此后40年，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活动，我国经济思想领域形成了各种经济理论观点和思潮。纵观这些思潮，其主要是由如下内容组成并按如下线索展开的：（1）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经济体制如何建立完善？（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走什么道路？（3）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基本理论应如何认识？由于各时期经济实践的内容不同，加上社会的政治的诸因素影响，因此不同时期经济理论思潮的内容、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有些经济思潮如涓涓细流，缓缓流过，不为人所瞩目；有些则似滚滚浪潮，汹涌澎湃，无人不被卷入；还有些则反复回潮，激起阵阵旋涡。当精神一旦转变为物质，错误的思潮无论如何具有权威性，无一把我国经济事业发展引入歧途从而遭致重大损失，而正确的思潮不管其在最初遭受什么厄运，最终会被世人所认识，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建国以来，根据经济思潮发展的不同内容与特点，大致可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下面我们循着历史的镜头来再现这思潮演进的轨迹。

1949年至1957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时期。这时期经济思潮主要以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如何起步及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为主要内容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问题也作了初步探索。当时经济思潮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因经济理论准备不足以及无自己经验积累，因此照搬照抄苏联，即受苏联

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因中国的国情特殊，同时苏联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及经济建设中的偏差也逐步暴露出来，因此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也开始试图探索一条我国经济建设独特发展的道路。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与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经济关系两大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我党制定了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围绕这一纲领的实施，经济学界进行了理论探讨。在保护工商业方面，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思想，即把前者作为处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关系的原则，把后者作为处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准则。这些思想对当时经济的稳定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经济关系方面，也着手对原有的私有制进行改造，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此，我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围绕这一条总路线的学习宣传贯彻，当时全国掀起了讨论总路线的热潮。在当时的讨论与以后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如下经济思潮：（1）“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生产力，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前提条件。（2）实现工业化应以苏联为榜样，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尽快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3）对农业与手工业的改造，要按照说服、典型示范的原则，把农民、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基础上实行公私合营。显然，这些思想对当时工业化建设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独特道路。

除了上述那些与社会经济政策变化紧密相联的经济思潮以

外,当时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经济思想界也进行了多次探索。

早在1953年,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后,我国曾联系当时过渡时期经济状况讨论了基本经济规律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适用于我国的过渡时期。其后,联系我国的经济工作的实践,又对经济体制、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当时因全面学习苏联业已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所形成的弊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陈云则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观点,即国家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经济学界,不少经济理论工作者也提出了相似观点,其中孙冶方的“把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论断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鉴于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践,1956年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及农轻重比例关系;处理好内地工业与沿海工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与本国创新的关系。陈云则强调了经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冒进与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根据这些思想,经济学界作了探讨和论证。当时马寅初“团团转”的综合平衡理论,控制人口、使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必须相适应的思想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但在极“左”思潮形成后,这些思想都遭到了批判。

1957年底到197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变革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曲折发展反复波动时期。这时期出现了各种经济思潮,大致涉及到如下问题:(1)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如何进一步变革完善?是按生产力发展要求稳步调整,还是超越生产力盲目拔高。

(2) 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是脱离比例效益盲目追求高速度，还是协调比例、稳定发展？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3)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是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定按劳分配，搞供给制与平均主义，还是坚持按劳分配？如此等等。当时经济思潮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极“左”经济思潮开始形成，并不断膨胀，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在“左”的思潮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下，也出现了不少正确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始终处于被压抑、被批判的境地。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在“一五”时期经济建设的基础上，1958年掀起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这之前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则为此作了思想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正如当时一些人所指出的：“一切为着发展生产力，应是我们的口号，应是照亮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然而以后的经济思想发展与经济建设实践并没有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发展，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走上了歧途。

引起这一转折的直接原因是：面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不断滋长起来了。同时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状况，又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急躁心理，特别是国际形势紧张化与国内反右斗争扩大化，竟又把阶级斗争夸大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原来已初步形成的一些正确经济思想被抛弃、被批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左”的经济思潮。其主要内容是：(1) 在经济建设方面，片面强调“大跃进”、“高速度”，主张留缺口的“积极平衡”，批判农轻重为序的综合平衡思想；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条件与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十五年赶超英国”、“钢铁产量一年翻番”、“粮食棉花一年增长六七成”等不切合实际的近似于神话的高指标

出现了，“全民动手，大炼钢铁”的瞎指挥产生了。(2)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全面鼓吹变革越快越好，即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要不间断地提高，以实行快速过渡。按劳分配，应逐步取消而实行供给制，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由此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掀起，所有制不断升级，“共产风”也越刮越凶。同时，城镇个体经济也一扫而空。

由极“左”思潮导向而形成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就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当时也有所察觉，并在1958年与1959年两次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及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若干纠正措施。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要肯定商品生产的作用，不要急于过渡。同时对那些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也作了调整，强调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然而，由于“左”的经济思潮未在根本上得到清算，因此在一定气候下又恶性膨胀起来。彭德怀1959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书以及对他观点的批判是随后“左”的经济思潮再度蔓延的直接导火线。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是抛弃了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才遭致这样大的损失。这些思想本来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但却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于是一场“反右倾”斗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这不仅使原来的“左”进程中断，而且使“左”的经济思潮再度泛滥，形成新的“跃进”，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然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随着“跃进”不断升级，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已全面失调，加上天公不作美所形成的严重自然灾害，当时经济已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为摆脱这种困境，1960年8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1961年11月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在这些文件中重申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正确处理

好农轻重三者关系等正确思想。同时指出，要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根本制度。此外，为从根本上扭转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状况，党中央还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把这作为此后二三年内的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围绕这一方针，经济思想领域就速度与比例关系、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关系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间，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这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除围绕着党的经济政策与方针等问题进行讨论之外，当时的经济理论探讨还涉及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主要以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问题与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为两条主要线索：

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问题上，大多数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仍起作用。否定这一点，经济发展就会走入歧途。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的原因、发展前景及范围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仍较大。有些同志把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两种公有制并存及按劳分配与按劳核算的存在，有些同志把社会主义经济还必须依据社会必要劳动、实行等价交换看成是基本原因，有些则强调了社会分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成中的决定作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围，一些同志坚持全民企业之间的交换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产品交换，商品交换只存在两种公有制之间。有些同志则认为，全民企业之间的交换也是商品，因为全民企业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前景，大多数同志认为，将来商品交换将转为产品交换，按劳分配所形成的交换则转为直接按需分配。个别同志强调商品经济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着，或者商品经济消失但反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律仍然存在。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孙冶方等同志仍坚持原有观点，并一再强调要把价值、利润等指标作为计划工作的重要指标，作为改革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工具。